

漢字文化圈的  
新視野

# 中國典籍

王勇

# 流傳與影響

主編  
陸堅  
王勇



日本文化研究叢書

中國典籍在  
日本的  
流傳與影響

陸 堅 主編  
王 勇

杭州大學出版社

# **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陆 坚 王 勇 主编**

\*

**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杭州天目山路34号)

\*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文艺音像出版社电脑排版 浙江富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1.25 印张 270 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

**书号: ISBN7-81035-068-4/G.031**

**定 价: (平) 6.00 元**  
**(精) 8.50 元**

# 日本文化研究丛书

中方顾问 沈善洪

日方顾问 石田一良

主 编 王 勇

# 中国的日本研究: 一个简短的回顾

——代丛书序

中国历朝正史对日本的记载，不失为研究古代日本的珍贵史料；但《宋史》(十四世纪)以前的官撰史书，均把“日本传”归入四夷之部，故尽管记奇风异俗、朝贡封赐颇详，其本身还称不上是对日本的研究。

明代，日本研究形成第一个高潮。《明史·日本传》自不待言，书名冠以“日本”的著作亦竞相问世。仅以嘉靖至万历约百年为例，研究日本的著作就可举出《日本考略》、《日本图纂》、《筹海图编》、《日本考》、《日本一鉴》、《经略复国要编》等，现已佚散的估计数量也很可观。明朝异乎寻常的日本研究热，究其原因，与倭患触发的海防关系密切，《日本考略·自序》云：“于兹猥属为《考略》，以便御边将士之忠于谋国者究览。”可见这些著作类似于敌国便

览，偏重于概况罗列，而轻于研究探讨。

迨至清季，在西方文化反复冲击下，古老的汉字文化圈渐趋解体，尤其是日本率先维新成功，踏上“脱亚入欧”之路，迫使素以文明宗主国自居的中国，不得不刮目视之。在这种背景下，清代出现第二次研究日本的高潮。依赖文献和传闻研究日本的时代遂告结束，中国人终于走出国门，通过实地体验，为后世留下丰富的访日记录，如《日本日记》、《使东述略》、《使东诗录》、《日本纪游》、《谈瀛录》、《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东游日记》、《扶桑游记》、《游历日本考察商务日记》、《游历日本考察农务日记》、《愚斋东游日记》等等，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是前代所无法相比的。然而，细读这些访日见闻，发现中国人所关注的，往往是日本西方化的层面，而非传统的思想文化，故可谓之“曲线的西方研究”。当然也有例外，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堪称明清日本研究的一座丰碑。

千余年来，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已经达到巨细无遗的地步；反观中国，自古以“华夷”色镜视人，一旦到了非摘下不可时，恍然犹如隔世，弱邻竟成强虏。甲午一战，“泱泱大国”败给“蕞尔小国”，从此中日反目成仇，更失去了客观研究对方的基盘。黄遵宪在《日本国志自叙》中发过慨叹：“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大夫好读古书，足已自封，……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此种状况至民国更甚，戴季陶有感于“中国”这个题目被日本人无数次解剖、化验，而国人不愿读日本字、不愿听日本话、不愿见日本人，更谈不上什么研究，于是发轫写了部《日本论》，算是填补了空白。清末以降，国人负笈东游者剧增，他们通过日语翻译了大量西学书籍，却很少有专门研究“和学”的。“五四”前后，周作人、钱稻孙等致力于介绍日本文学，因囿于文人士夫圈子，终未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奇迹般腾飞以及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长期困扰日本研究的两大障碍——“华夷思想”与“敌国意识”渐被清除，短短数年时间，大学的日语专业成倍增加，各种研究机构纷纷设立，研究日本的第三次热潮，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席卷全国。尤其是近十年来，有关日本的翻译、著作、论文以几何级数猛增，这表明“日本”这个题目，终于被中国人放到手术台上认真地解剖了。稍嫌不足的是，解剖的部位存在明显的偏向，即语言文学、政治经济等分野人才济济，硕果累累，而艺术、民俗、思想、宗教、社会等广义的文化领域则门庭冷落，鲜有人涉足。

对日本文化研究的概念，很难作出精确的界定，或可比作对“日本”这个题目的综合解剖。从局部研究过渡到综合研究，是日本研究的又一次质的飞跃，其重要性渐为人们所认知，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自1985年始设日本社会文化硕士专业，杭州大学于1988年承办日本文化史大学师资培训班，均为日本文化研究的勃兴蓄积了人才。鉴于国内迄今尚无一块属于日本文化研究者的学术园地，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推出的这套丛书，显然正逢其时。但愿这套丛书能为日本文化研究摇旗呐喊，为中日文化交流添砖加瓦。

本丛书聘请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教授任中方顾问，日本思想史学会名誉会长石田一良博士为日方顾问，主编由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副教授担任，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负责日常编务。

编 者

1990年10月

## 前 言

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从莽莽的昆仑坳，到巍巍的富士顶，仿佛架着一座无形的长桥。两千年来，尽管几度暴雨狂涛，但这座长桥断了又接牢。风波九死的鉴真，为这座长桥作过贡献；沉月虚惊的晁衡，为这座长桥付出辛劳。中日两国的典籍，是构建这座长桥的一种重要材料。

我们这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正在大踏步地迈向新的纪元，国际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和深化。人们追根溯源研究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也已蔚然成风。典籍，作为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载体，是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认真清理这份遗产，探究它的深藏奥秘，描述它的真实面貌，评论它的千秋功过，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相当艰巨而又富有魅力的历史使

命。

因此，我们不揣昧，勇承其任。为了充分体现学术个性，尊重研究者对客体独特的探索精神，我们决定尝试着先编这部论文集——《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构想一传开，很快得到中日有关学者的热诚关切和大力支持。他们或来函指教，或寄赠资料，或惠赐佳作。我们构想的课题，还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确定为国际科研项目。这些都使我们既受鼓舞，又感愧怍。

对于中日古代文化，我们只是初涉藩篱，但愿略尽绵薄。谨以此引玉之编，奉献自己的赤忱，期望有更多的人寄心于中日古代文化的研究并编写出更好的作品，期望中日典籍在世界学术研究之林焕发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

# 目 录

## 中国的日本研究: 一个简短的回顾

——代丛书序

### 前 言

#### 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东传日本的轨迹

- 中国文化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研讨 ..... 严绍璦 ( 1 )  
关于东传汉籍的研究方法与资料 ..... ( 日 ) 大庭 脩 ( 38 )  
美国华译

#### 汉籍东传诸说考辨

- 从文化交流的视角考察汉籍在东亚的流播 ..... 王 勇 ( 49 )  
《庄子》东传考略 ..... 王 勇 ( 66 )  
《世说新语》在日本 ..... 马兴国 ( 79 )  
张志和《渔父》的流播与日本填词的滥觞 ..... 陆 坚 ( 92 )  
《源氏物语》的结尾

- 白乐天与紫式部 ..... ( 日 ) 中西 进 ( 114 )  
陆 越译  
许 雁校

- 中国讲史小说与日本通俗军谈 ..... ( 日 ) 德田 武 ( 120 )  
许 雁译  
王 勇

- 《水浒传》对江户小说的影响 ..... 李树果 ( 167 )

- 《易》的东传与日本古代文化中的阴阳道观念 ... 刘 萍 ( 186 )

|                       |                |
|-----------------------|----------------|
| 二十四孝在日本的传播与衍变·····    | (日) 德田 进 (202) |
|                       | 钱晓晴译           |
|                       | 王 勇校           |
| 汉文佛典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 屠承先 (214)      |
| 近代日中语言交流史序论           |                |
| ——方以智《物理小识》考 ·····    | (日) 杉本 孜 (240) |
|                       | 徐萍飞译           |
|                       | 王宝平校           |
| 江戸时代末期的舶载中国书籍与日本···   | (日) 大庭 修 (269) |
|                       | 王 勇译           |
| 《海国图志》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 | 王晓秋 (279)      |
| 《文馆词林》在日本的流传及其所存残卷的   |                |
| 文献价值·····             | 林家骊 (299)      |
| 日本胡文焕丛书经眼录·····       | 王宝平 (322)      |
| 作者简介                  | (339)          |
| 编后记汉籍与汉字文化圈           | (344)          |

# 中国古代文献典籍 东传日本的轨迹

——中国文化的 world 历史性意义的研讨

□ 严绍澍

中国文献典籍东传日本列岛，就其历史的悠久和传播的规模而言，它不仅构成了中日两大民族文化交流的极其重要的内容，而且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关系史上，也是蔚为壮观的。

在古代漫长的岁月中，中国文献典籍的东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变异，它的传播具有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式，这不仅影响着古代日本文化的发展，而且直接造就了日本传统汉学中的许多特点。

本文将按照古代日本文化依次递进的发展阶段——飞鸟奈良时期、平安时期、五山时期、江户时期——考察中国文献典籍东传日本的轨迹。

## 飞鸟奈良时代：以人种交流为自然通道的传布形式

日本学者常常认为，日本文化是在六世纪之后，由于佛教的传入而渐趋兴盛的。中国的典籍文献也正是在佛教向日本传播的过程中，由僧侣们首先传入的。一部分中国学者也持有这种观点<sup>①</sup>。

然而，如果就日本文化史的实际情况来看，其实，佛教是随着中国文化的东传而逐步传入日本的。史传公元522年，中国梁朝司马达抵达东瀛而佛教始入日本。此后，在飞鸟奈良时期，佛教的传入确实构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一种渠道，形成了一个方面的内容，但是，它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特别是作为此种交流的主要载体——中国文献典籍传入日本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渠道。

### （一）最早传入日本的汉籍

中国文献典籍在此之前早已开始传入日本。日本现存最早的书面文献《古事记》卷中“应神天皇”条记载曰：

天皇命令百济国说：“如有贤人，则贡上。”按照命令贡上来的人，名叫和迺吉师，随同这个人一起贡上《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和迺吉师是文首等的祖先<sup>②</sup>。

这是中国文献典籍传入日本列岛的最早的记录。这位百济人和迺吉师，即是《日本书纪》提到的“百济博士王仁”。《日本书纪》的成书，仅晚于《古事记》八年，这一名姓的差异，其原因是因为《古事记》用一种类似“万叶假名”的文字写作，而《日本书

纪》则是用汉文撰写的。这位王仁博士，从他的姓名与文化教养上可以推知，他是一位生活于当时朝鲜半岛的汉族移民，抑或是一位汉族移民的后裔。《古事记》中提到了《千字文》，这是一个疏漏，因为《千字文》是在应神天皇之后百余年才编撰的。尽管如此，这一记载无疑表示了公元三世纪的时候，中国文献典籍已经传入日本列岛了。

《日本书纪》记仁德天皇事曰：

四年春二月，诏群臣曰：“朕登高台以远望之，烟气不起于域中，以为百姓既贫而家无炊者，朕闻古圣王之世，人人诵咏德之音，家家有康哉歌。今朕临亿兆于兹三年，颂音不聆，炊烟转疏，即知五谷不登，百姓穷乏也。封畿之内，尚有不给者，况乎畿外诸国耶？”三月，诏曰：“自今之后，至于三载，悉除课役，惠百姓之苦。”

七年夏，天皇居台上而远望之，烟气多起，是日语皇后曰：“朕即富矣，岂有愁乎？”皇后且言：“官垣坏而不得修，殿屋破之衣被露，何谓富乎？”天皇曰：“天之立君，是为百姓，然则君以百姓为本。是以古圣王者，一人饥寒，顾之责身。今百姓贫之，则朕贫也；百姓富之，则朕富也。未之有百姓富之，君贫矣。”<sup>③</sup>

仁德天皇是应神天皇的长子，他的这一套关于“霸民贫富观”，以及为此而推行罢免民众三年课役的政策，无疑来源于《论语》。他所说的“百姓贫之，则朕贫也；百姓富之，则朕富也”云云，便是《论语·颜渊篇》中所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极生动的活用。

当然，《论语》并不是当时在日本列岛流传的唯一的中国典籍。据《日本书纪》卷十一记载，公元三世纪应神天皇去世后，

太子菟道稚郎子与其兄大鸕鹦互让帝位。弟兄二人对话如次：

誉田天皇（即应神天皇）崩。时太子菟道稚郎子让位于大鸕鹦尊。未即帝位，仍谕大鸕鹦尊：“夫君天下以治万民者，盖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欢心，以使百姓，百姓欣然，天下安矣。今我也弟之，且文献不足，何敢继嗣位，登天业乎？大王者风姿岐嶷，仁孝远聆，以齿且长，足为天下之君。其先帝立我为太子，岂有能才乎，唯爱之者也，亦奉宗庙社稷重事也。仆亦不佞，不足以称。夫昆上而季下，圣君而愚臣，古今之常典焉。愿王勿疑，须即帝位，我则为臣之助尔。”

大鸕鹦对言：“先皇谓皇位者一日之不可空，故予选明德立王为耳，祚之以嗣，授之以民，宠其章令闻于国。我虽不贤，岂弃先帝之命辄从弟王之愿乎？”

固辞不承，各相让之。

这一事件的演进，与《左传》“僖公五年”及《史记·周本纪》所记载周泰伯、仲雍让位季历事极类似，甚至可以看作是以《左传》、《史记》并《论语》等为台本的演义。如果没有诸如上述这些中国文献典籍的东传，三世纪时代的两位日本皇子，是断不会演出如此精彩的场面的。

## （二）推古朝《十七条宪法》与汉籍

到公元七世纪初，中国文献典籍在日本的传布，已经远远超出了诸如《论语》、《千字文》这样狭小的范围了。公元604年，推古朝圣德太子制定《十七条宪法》，作为国家立国的政治准则和官僚群臣的行为准则。此《十七条宪法》一曰“以和为贵”，“上和下睦”；二曰“笃敬三宝”；三曰“承诏必谨”；四曰“以礼为本”；五曰“绝谗弃欲，明辨诉讼”；六曰“惩恶劝善”；七曰“人各

有仁，掌宜不滥”；八曰“早朝晏退”；九曰“信是义本”；十曰“绝忿弃瞋，不怒人违”；十一曰“明察功过，赏罚必当”；十二曰“勿敛百姓”；十三曰“勿妨公务”；十四曰“无有嫉妬”，“千载以难待一圣”；十五曰“背私向公”；十六曰“使民以时”；十七曰“事不可独断，必有众宜”云云④。《十七条宪法》不仅反映出它深受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而且，不少条文的遣词造句，亦直接来自中国的文献典籍。如第一条“和为贵”则取自《礼记·儒行篇》“礼之用，和为贵”，而“上和下睦”，则取自《左传》“成公十六年”中“上下和睦”和《孝经》“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第三条“上行下靡”取自《说苑》；第四条“上不礼而下不齐”取自《韩诗外传》；第十四条“千载以难待一圣”取自《文选·三国名臣传序》等等。总计十三条二十一款的文字，取自中国如《周易》、《尚书》、《左传》、《论语》、《诗经》、《孝经》、《韩诗外传》、《礼记》、《庄子》、《韩非子》、《史记》、《说苑》和《昭明文选》等文献典籍。

当时日本的都城在今日的奈良地区。本世纪中期以来，对奈良市郊平城宫遗址进行了开掘。在此遗址中有木简残片，可以确认有若干中国文献典籍的名称，如《本草集注上卷》、《李善注文选》、《千字文》等，并在若干木简上，残留有这些典籍的一部分摹写文字。

### （三）上古时代的移民与汉籍东传

这些都是七世纪以前发生的文化现象。当时，中日两国之间，还尚未有如后来“遣隋使”、“遣唐使”那样正式的政治文化关系，也没有直接的贸易渠道。我们知道，当佛教传入中国本土之后，儒佛二道，视若水火，互为克星，在此种相互仇讎的观念下佛教由中国本土传入日本列岛，是断不会把儒家视为安身立命的经典，一起带往他乡的。

中国文献典籍早期的东传，主要是通过人种的交流来实现的。这是业已存在千年以上的中日文化关系的最早时期的最原始

形式的通道。

日本《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皆有“记纪神话”系统。从这一神话系统中可以看到最早时期的人种交流在文化上所留下的烙印⑤。

据《日本书纪》卷十记载，公元前二世纪应神天皇年间，“倭汉直祖阿知伎主、其子都加伎主并率己之党类十七县而来归焉”。其后，成书于公元815年的日本《姓氏录》又曰：“仁德天皇时，秦氏流徙各处，天皇使人搜索鸠集，得九十二部一万八千七百六十人。”云云。对于早期中国大陆向日本的移民，在“日本人类学史”和“日本汉学史”上有专门的名称，习惯上把公元三世纪至七世纪之间移徙日本的中国人，称为“新汉人”。

今天在日本人的姓氏中，有一个读若“はた”（Ha ta）的姓。“はた”是“织布的机械”的意思，日本最早的纺织是由中国传人的。这一部分人便称“はた”，用若姓氏，汉字表示为“秦”。“秦”氏繁衍，有许多的子姓，诸如“羽田”，“羽太”、“波多”、“幡多”、“八田”等等，然而，这些子姓也全部读若“はた”，他们是中国人的血统，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⑥。

关于这一段中日人种之间的融合，中日两大民族之间存在着一个古老而又扑朔迷离的传说，这便是徐福带领童男童女东渡日本的故事。如果我们不是把徐福赴日本看成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把它看作是在上古时代的几个世纪内，中国大陆曾经发生过向日本列岛移民这样一个总体事实的历史描述，那么，这个故事传说是很有意义的⑦。

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最早起源于十世纪左右的日本列岛，反馈回中国，首载于《义楚六帖》之中而传播国内，敷衍弥漫，遂成今日故事。近几年来，国内新闻媒介报导，江苏省发现所谓“徐福村”，谓徐福由此率队启航日本云云，尚缺少起码的文物文献实证。